

刘文超 著

后凯恩斯主义 增长理论研究

RESEARCH ON POST KEYNESIAN
THEORY OF GROWTH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河北农业大学现代农业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河北省农业农村经济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
河北省软科学研究基地（省“三农”问题研究基地）资助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6LJ004）

刘文超 著

后凯恩斯主义 增长理论研究

RESEARCH ON POST KEYNESIAN
THEORY OF GROWTH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研究 / 刘文超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 - 7 - 5141 - 6002 - 4

I. ①后… II. ①刘… III. ①新凯恩斯主义 - 研究
IV. ①F091. 348.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96351 号

责任编辑: 王冬玲

责任校对: 杨 海

责任印制: 邱 天

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研究

刘文超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 //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万友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5. 25 印张 260000 字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6002 - 4 定价: 45. 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序 一

刘文超博士的《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研究》是一篇成功的博士论文，在评阅中得到匿名评审专家的充分肯定，在答辩中获得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作为刘文超博士的导师，我感到欣慰。现在他的这篇论文即将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我向他表示热烈祝贺。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研究领域。有不少经济学家被经济增长问题所吸引，长期从事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

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有两个重要的分支：一是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一是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二者的共同渊源是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哈罗德和多马各自建立的增长模型，是现代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史上的第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目的是将凯恩斯的短期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长期化和动态化。哈罗德 1937 年的论文《关于动态理论》和 1948 年的专著《动态经济学》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增长理论研究的开山之作。哈罗德根据凯恩斯静态均衡条件： $I=S$ ，推出动态均衡条件： $g = \frac{s}{v}$ ，其中， s 代表社会平均储蓄率， v 代表社会生产的资本—产出比。这一基本方程式的含义是：实现经济均衡增长的基本条件，乃是把产量（收入）的增长率提高到使它所引起的投资恰好能吸收本期的全部储蓄的程度。

哈罗德提出三种增长率：（1）实际增长率 $g_a = \frac{s_a}{v_a}$ ，由实际发生的储蓄率和实际资本—产出比决定；（2）有保证的增长率 $g_w = \frac{s_r}{v_r}$ ，是企业家愿意有的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所形成的增长率，即事前计划的增长率；（3）自然增长率 $g_n = n$ ， n 为外生的人口增长率。哈罗德认为，稳定增长会遇到两种不同的障碍：即： $g_w \neq g_n$ ； $g_w \neq g_a$ ，资本主义经济在实践中没有机制能保证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自然增长率三者保持一致，所以经济增长是不稳

定的。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不满意哈罗德等人的上述结论，他们对哈罗德—多马模型作了重要修正。索洛和斯旺在 1956 年的论文代表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产生，它们所要解决的是哈罗德模型不稳定的原因是什么，怎样给模型引入稳定性。索洛认为，哈罗德所说的经济不稳定性，是指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产生的根源在于他的固定比例生产函数的苛刻假设。

索洛的增长模型建立在三个方程之上：连续的总量生产函数 $Y = f(K, L)$ ；劳动力（人口）增长函数 $\frac{\dot{L}}{L} = n$ ；储蓄函数 $S = sY$ ，以及由储蓄投资恒等式得到的投资函数 $\dot{K} = sY$ 。经数学变换，可推导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方程： $\dot{K} = sf(k) - nk$ 。其中 $k = \frac{K}{L}$ ，表示资本—劳动比，或人均资本。基本方程表明，当前人均资本 k 、储蓄率 s 、人口增长率 n 共同决定人均资本 k 的变化（ $\dot{k}$ ）。索洛用图示说明了经济增长稳态的存在（均衡增长率）和稳定性；经济在稳态时，总产出增长率取决于外生人口增长率，而独立于储蓄率。索洛模型的含义是：因为要素是平滑可替代的，所以资本—劳动比是可变的，从而资本—产出比也是可变的，即 $g = \frac{s}{v}$ 总能通过资本—产出比 v 的调整实现 $g = \frac{s}{v} = n$ 。可见，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生产中会发生劳动与资本的自由替代，生产中的资本—劳动比最终会达到稳态值 k^* ，从而实现充分就业。

新古典增长模型采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迎合了当时逐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正因为如此，这一理论一经提出，便很快取代了不太有利于粉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成为西方正统经济理论新古典综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卡斯（Cass）和库普曼斯（Koopmans）把拉姆齐（Ramsey）1928 年最优储蓄理论和索洛—斯旺模型进行结合，创造了最优增长理论。最优增长理论从消费者的视角分析经济活动，把消费者的储蓄行为作为研究的焦点。作为消费者的代表性个体，在连续的时间点上做出消费和储蓄的决策，使得无限时期的效用流的现值最大化。自此，新古典增长理论由于过于技术化，逐渐失去与经验应用的联系；又由于回避了

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解释，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于是进入 20 年左右的停滞期。

西方增长理论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兴起了“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又叫作内生增长理论。在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期，新增长理论家主要在完全竞争假设下研究长期增长率的决定。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巴罗模型、雷贝洛模型、琼斯—真野模型等都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模型。从 90 年代初以来，新增长理论家主要在垄断竞争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产品种类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产品质量升级型内生增长模型、专业化加深型内生增长模型等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性模型。

新增长理论的主要思路是：肯定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并对技术进步的实现机制进行理论分析。新增长理论家认为，技术进步并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家所理解的那样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主要是经济当事人从事研究和开发的结果。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边干边学、人的素质的提高、新型资本品或消费品的出现、产品质量的提高等。

新增长理论否定了早期增长理论关于市场机制能够保证经济沿着最优增长轨道移动，政府的经济政策不具有长期影响的观点，承认市场机制可能造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低效率，认为适当的政府干预有助于经济增长。从而使新增长理论比原有的增长理论前进了一步。但是，由于新增长理论家仍然囿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采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构建他们的模型，因而这种进步是有限的。新增长理论家的论证只不过是想说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利用政府干预实现最优增长。

对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行修正的另一股力量是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也创立了新剑桥增长模型。其中，卡尔多与罗宾逊的增长模型影响最大。新剑桥增长模型是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早期成果。

新剑桥增长模型的特征是把增长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体现在两点：一是增长决定收入分配，二是收入分配的调节使储蓄适应投资。

新剑桥学派的利润决定理论（又称作分配理论）是新剑桥增长模型的基础。新剑桥学派的利润决定理论来源于卡莱斯基。卡莱斯基把有效需求原理和古典经济学的阶级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根据有效需求原理，产出由投资和消费支出决定；根据阶级分析方法，社会可以分为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他们的收入分别来自工资和利润，工人的储蓄倾向为零，资本家的储蓄倾向为正。由

这两方面的规定，得出利润决定原则：“工人花费他们挣得的，资本家挣得他们花费的”。也就是说，资本家的利润由他们的投资和消费支出来决定，用公式可表示为： $P = \frac{1}{s_c} I$ ，它被称作卡莱斯基利润方程。新剑桥学者把卡莱斯基利润方程动态化——通过把方程两边同除以资本存量 K ——得到利润率的决定方程： $r = \frac{1}{s_c} \cdot g$ 。

利润率决定方程 $r = \frac{1}{s_c} \cdot g$ 被称作剑桥方程式，它表明宏观经济利润率与资本积累率 g （或称经济增长率）成正比，与利润储蓄倾向 s_c 成反比。新剑桥经济学家认为利润决定的机制是：资本家消费和投资支出增加，引起社会总需求增加，导致物价上升，工人实际工资下降，从而利润率上升。所以，后凯恩斯主义利润决定理论的实质是利润实现理论，而不是利润生产理论；工资份额与经济增长速度呈反向关系；隐含产能充分利用的假设，也就是说经济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因为只有此时，投资需求的变动才会反映在物价变化上，同时，利润与工资也才处于此消彼长的完全对立状态。

新剑桥收入分配理论对于增长理论的意义在于说明：“投资”为自己创造“储蓄”，经济可以实现稳定增长。投资增加促使利润份额增加，利润份额的上升因利润储蓄倾向大于工资储蓄倾向而引起社会平均储蓄率的上升，从而产生足够的储蓄来支持企业家进行的投资。所以，储蓄由投资内生。剑桥分配理论找到了一条解决哈罗德难题的道路。如前所述，哈罗德增长模型提出充分就业稳态增长的条件是有保证的增长率 $\frac{s}{v}$ 等于自然增长率 n ，即 $\frac{s}{v} = n$ 。哈罗德认为， s 、 v 、 n 是三个独立变量，无法保证稳态条件的实现。卡尔多等人则认为， s 不是常量，是一个可变量。对应于每一个收入分配，就有一个社会平均储蓄率，相应地有保证的增长率也有多个。对于每一个自然增长率 n ，总有一种收入分配 $\frac{P}{Y}$ 使社会平均储蓄率 s 符合 $\frac{s}{v} = n$ 这一充分就业稳态增长条件。卡尔多深信现实中这种满足稳态条件的分配必然实现。

索洛模型是通过把资本—产出比 v 作为一个变量而解决哈罗德稳定性问题的。与此不同，卡尔多模型的方法意味着总的平均储蓄倾向 s 不再是一个常数，将存在一个利润对收入之比能够保证总的平均储蓄倾向恰好能符合要求。卡尔多对西方经济在战后阶段中充分就业的近乎稳定的增长这种“典型事实”

的解释是，收入分配一直是恰当的。

罗宾逊、卡尔多等创建的新剑桥增长模型由两大核心要素即利润实现机制和投资决策机制构成。利润实现机制表明投资产生利润，而投资决策机制表明利润诱导投资，把两种机制结合起来，就会发现利润和投资之间具有一种双边关系：投资产生利润，利润诱导投资。这种双边关系以动态的形式表现就是：积累率决定利润率，利润率诱导积累率。剑桥增长模型表达了一种投资产生利润、利润产生投资的螺旋上升过程，当然这种螺旋并不是无止境的，而是受到企业家动物精神的约束。

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是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产生的。前者继承了凯恩斯的遗产，而后者则回归了新古典主义传统。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曾经风光一时，它运用阶级分析和关注收入分配与增长的关系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它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一起构成现代增长理论的支柱。但当经济增长理论共同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的失落之后，新古典增长理论在“内生增长理论”的旗帜下迎来了新的繁荣，而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仍在黑暗中徘徊，未找到前进的方向，逐渐地被边缘化。现代西方增长理论中新古典主义的内生增长理论目前暂时处于绝对优势，作为增长理论另一个分支的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近乎被遗忘了。

刘文超博士的毕业论文《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研究》对这一曾经辉煌一时，而如今被逐渐边缘化、被遗忘的西方增长理论的分支进行了分析、评议和批判。作者提出了不少独立见解，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几点。

第一，作者认为，20世纪60~80年代的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长期片面地沉溺于内生分配理论的模型推导，抛弃更根本的投资、预期、不确定性这一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原有的核心内容。这是它最终走向停滞的根本原因。只有恢复独立投资函数的核心地位，推进投资决策机制的研究，才有可能重现活力。

第二，作者对后凯恩斯主义新的和旧的增长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并对新增长模型的发展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归纳和总结出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发展进程中发生的当代转向的内涵，对这种转向的积极意义与不足进行评析，并对其前途做出展望。这有助于推动我国学界研究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发生的当代转向——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对新剑桥增长模型的取代——及其现实意义。

第三，作者把后凯恩斯主义新增长理论（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转化为利润导向增长体制向工资导向增长体制转变的理论，区分了收入分配策略与增长体制，认为实施亲劳动的分配策略的第一步是构建工资导向的增长体制，并提出了工资导向增长体制形成的社会和文化条件。

在此我想说一下，刘文超博士的研究是在西方增长理论范围之内展开的，这项研究以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为参照，对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入挖掘和系统评述。这一研究当然有其价值和意义。但是，若想对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有更深刻的认识，在增长理论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必须跳出西方增长理论视野的局限，深入了解马克思增长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增长理论。

马克思是第一位系统研究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马克思创造性地将组织、技术、制度和生产要素间的关系结合起来，率先从动态角度加以分析，得出了具有开创性的重要理论成果。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在谈到经济增长理论历史沿革时承认：增长模型，可以追溯到马克思。

马克思从19世纪50年代末开始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到19世纪90年代初最终完成了他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体系，前后经历了几十年的漫长探索过程。马克思通过对英法古典经济学家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批判和继承，认识到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时必须同时考察两个关键问题：以产品补偿产品即实物补偿问题，以价值补偿价值即价值补偿问题。沿着这一思路，马克思从实物形式上把社会总产品区分为生产资料生产部类（第一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部类（第二部类），从价值构成上把社会总产品分解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体系即经济增长理论体系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含以下几个主要组成部分：个别资本再生产和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关系；两种基本前提或两种构成原理；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或平衡条件；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或平衡条件；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或平衡条件会转变成失常的条件。

在《资本论》第二卷问世后的几十年中，西方经济学家无力解读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马克思独立地拓荒的这个科学领域，不仅在恩格斯1885年撰写《资本论》第二版序言时是“至今几乎还没有人进入的领域”，而且直到剑桥学派的琼·罗宾逊1942年发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

“这一领域大部分仍无人耕耘过”。同过去相比，现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已能解读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他们懂得，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就是经济增长理论。西方经济学家现在并不讳言马克思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所作的开创性贡献，而是承认存在“马克思的增长理论”，承认“马克思是一位增长理论家”。

西方经济学家不仅承认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还承认最早的经济增长数学模型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建立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菲尔德曼对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开创性拓展，最早提出了描述经济增长问题的数学模型。菲尔德曼 1928 年在他的著名论文《论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理论》中明确提出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数学模型。他的成果既引起了后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重视，又引起了后来研究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模型的西方经济学家的重视。

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有一些相似之处。首先，二者均源自英法古典经济学。其次，二者均着重从宏观层面分析论证经济增长的特征。但是，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存在着本质区别。从理论基础、分析框架、假设条件、研究工具、技术与制度的作用、总量生产函数构造等角度，将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与西方经济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比较，有助于从整体上对西方增长理论做出全面评价，也有助于对西方增长理论各分支之间的特征、优劣和得失做出正确判断。

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坚信，要创建指导中国经济增长的科学的和实用的增长理论体系，必须以马克思增长理论为基础，从中国经济增长实际出发，批判地吸取西方增长理论的有意义的因素。

刘文超博士的这部著作有助于了解和认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有助于了解和认识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值得经济理论工作者和青年学生一读。

吴易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6 年 5 月

序 二

刘文超的专著《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研究》，对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性的研究，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近年来，经济增长理论逐渐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发展迅速，对于分析经济现象和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经济学界和政府经济政策领域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理论而言，经济增长理论有助于更好分析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经济增长理论解释了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动力和原因，分析穷国和富国收入差距的原因；以及解释了为什么穷国和富国之间存在差异；由最初简单的各个变量的外生给定，到各个变量逐步的内生给定的经济增长模型，逐步完善了经济增长的模型。经济增长理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界探讨一系列经济问题的基本框架，是分析和探讨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其已经成为宏观经济理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越来越多的是作为其他领域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经济学家在内生经济增长的框架下引入更多更加现实的假设，为了从特定的角度分析一些具体的问题。经济学家将更多的投入要素融合到生产函数中，探求这些要素同经济增长的关系。

经济增长理论的快速发展使得经济学家和政府经济部门能够更全面地认识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和动力，有效地推动了各个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改善各国的经济增长政策。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及模型，一直是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家族中的重要成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以专注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而备受关注。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相应地被区分为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和新增长模型，前者归因于罗宾逊和卡尔多的贡献，被称作新剑桥增长模型；后者继承了卡莱斯基的传统，被称作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

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是在哈罗德 (Harrod)《动态经济学》的启发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同时产生的;前者继承了凯恩斯的遗产,而后者则回归了新古典主义传统,二者形成分庭抗礼的关系。曾经的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风光无限,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一起构成现代增长理论的支柱。但当经济增长理论共同经历了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失落之后,新古典增长理论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旗帜下迎来了新的繁荣,影响不断膨胀;而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虽然从新剑桥模型升级到新卡莱斯基模型,但无法避免被边缘化的命运。

新剑桥增长模型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影响巨大,支撑起增长理论的半边天,主要原因有两点。首先,新剑桥增长模型是凯恩斯主义的忠实信徒把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由短期分析扩展到长期动态分析的成果,在凯恩斯主义如日中天的当时,这一扩展成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推崇。其次,新剑桥增长模型确实通过加进一些马克思主义因素——例如,阶级对抗、利益冲突、收入分配——提高了分析穿透力和深刻性,新剑桥增长模型作为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综合的产物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中国学者对新剑桥增长模型是比较熟悉的,原因之一就是新剑桥模型的创立者罗宾逊和卡尔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多次来我国进行访问、讲学,他们与中国学者之间的交流比较多,并且他们都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抱有友好的态度。

当然,新剑桥增长模型也存在缺陷。首先,从理论上说,它和凯恩斯的短期理论不一致,因为在凯恩斯短期分析中,收入调节使经济趋向均衡,而在后凯恩斯旧增长模型中,经济趋向均衡的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数量的变化,而是借助价格机制,进而通过收入分配的调整实现储蓄投资相等;其次,从实践上说,旧增长模型关于工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利润率反向变动的结论与事实不符。最后,最重要的是,新剑桥增长模型揭示的是增长对分配的影响,而对于收入分配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没有进行解释。在该模型中,收入分配——工资率和利润率的决定——是由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内生决定的,收入分配状况完全从属于经济增长的过程,收入分配本身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自主因素,相反它是取决于增长速度的因变量。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在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内部出现了对新剑桥增长模型的反思和批判,并尝试开发与现实经济实践以及凯恩斯理论更为一致的增長模型,这些模型更多地继承了卡莱斯基的经济分析传统,因此,这些模型被

称作“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以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为基础扩展开来的大量关于增长的理论研究使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

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在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初创期和 90 年代的成熟期之后，如今它已基本取代了新剑桥增长模型成为当代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的主体。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被认为是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的“升级版”，相比自己的前辈具有明显的优势。

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对新剑桥增长模型的取代无疑是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发展进程中的一次转向，这种转向是全方位而又具有根本性的。就增长模型构建本身来看，从产能利用率外生给定转变到产能利用率由收入分配决定的内生变化，从分配由投资内生决定转变到分配被外生给定，从揭示节约悖论转变到揭示成本悖论，从揭示增长对分配的影响转变到揭示分配对增长的影响；就方法论特征来看，从灵活价格机制、完全竞争、充分产能利用等理想化世界预设转变到对寡头垄断、冲突性通胀、路径依赖等真实世界的考察；就模型关注的重心来看，从利润实现机制研究转变到投资决策机制研究；就模型提供的政策含义而言，从收入再分配问题转变到经济增长体制问题。

当然，二者最根本的区别我们可以归结为一个假设和一个结论上的分歧。就假设而言，后凯恩斯主义旧增长模型假设的是一个完全竞争世界，进而产能处于充分利用状态，而新增长模型假设的是一个寡头垄断世界，因此经济长期运行在过剩产能状态；就结论而言，旧增长模型最重要结论是，实际工资率（或工资份额）与利润率、积累率之间长期中呈反向关系，提高积累率从而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以牺牲工资率为代价，而新增长理论的关键结论则是，实际工资率和利润率、积累率之间通常有一个正向关系，不同阶级之间可以实现共赢，提高工资收入的再分配有利于经济增长。

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变成了一个纯粹研究收入分配的增长效应的理论，它对于研究增长问题更具针对性和政策导向性。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在分析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滞胀、发展中国家自由化改革失败、美国 2008 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等问题上提供了较深刻的分析视角，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尽管如此，与新古典增长理论尤其其内生增长模型相比，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地位下降了。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在解释力、实用性上弱于新古典的内生增长模型，而是在于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的二三十年，思想理论界自由放任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占了

绝对上风,新古典经济学的霸权进一步巩固,一切反主流经济理论遭到压制,这导致经济理论界对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但这种局面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改变,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于2008年之后的资本主义主要国家陷入衰退现象无法提供解释,而新卡莱斯基增长理论从阶级结构、收入分配、需求维持方式等角度提出了大量有见地的分析,逐渐地得到重视。

该书的结构,由历史性批判、新进展追踪、创造性转化、他国经验与中国启示等四部分组成。

本书有两大特点:首先,作者对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做了长跨度的梳理和批判。作者对后凯恩斯主义的旧增长理论——新剑桥增长模型——的初创时期的原貌进行了还原,对其发展过程进行了阐述,同时对其精神实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分析,这种分析奠定了全书分析的基础。随后作者对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新进展进行了追踪研究,这一部分对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发展——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进行研究,通过与旧增长模型的比较,把握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特征,评估它对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发展进程的影响,挖掘它的合理内核,探讨它的不足。其次,作者理论联系实际地构建了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新模型。作者以中国增长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增长方式转变问题为导向,以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科学因素为出发点和构件,构造出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增长模式转变模型,建立起社会因素与增长的联系,以新视角分析中国经济增长问题。

本书取得了两大探索性、具有理论创新性的成果。第一,作者指出,20世纪60~80年代的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长期片面地沉溺于内生分配理论的模型推导,抛弃更根本的投资、预期、不确定性这一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原有的精髓,是它最终走向停滞的根本原因;只有恢复独立投资函数的核心地位,推进投资决策机制研究,才能使之重新焕发活力。第二,作者将后凯恩斯新增长理论转化为从利润导向向工资导向增长体制转变的理论,并提出了工资导向增长体制形成的社会、文化条件。作者认为,对后凯恩斯主义新增长模型做出扩展,放松假设条件,引进工人储蓄、政府部门和国际部门,就能构建分析工资导向增长的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分析税收制度、储蓄制度、货币制度、资本市场制度、外贸制度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刘文超的专著《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研究》,源于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治学态度严谨,具有扎实的理

论功底，潜心研究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并理论联系实际地构建了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新模型，以新视角分析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既具相当的学术价值，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而，本专著的研究成果可供关心和从事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专业人士、高等院校经济学专业的师生们参考。

王 健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6年5月

目 录

第1章 导论	1
1.1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界定	1
1.2 文献综述	6
1.3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4
1.4 主要观点、创新和不足之处	18
第2章 后凯恩斯主义的一个早期经典增长模型	21
2.1 罗宾逊—卡尔多增长模型概览	21
2.2 罗宾逊—卡尔多增长模型评析	28
第3章 跋行的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	31
3.1 卡尔多的分配理论及其一般化	31
3.2 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攻击：反帕西内蒂定理	38
3.3 后凯恩斯主义者对“反帕西内蒂定理”的回应	39
3.4 罗宾逊的分配理论	43
3.5 如何看待后凯恩斯主义分配理论的发展	47
第4章 重新定位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理论背景考察	50
4.1 古典经济学中的增长理论	50
4.2 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产生、特征与发展	53
4.3 新古典投资理论	59
4.4 结论	62

第5章 重新发现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的实质：投资、预期、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	63
5.1 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投资	63
5.2 独立投资函数	67
5.3 企业家预期	69
5.4 根本不确定性与动物精神	72
5.5 动物精神与经济增长	74
5.6 小结：遗产与悬而未决的问题	75
第6章 后凯恩斯主义新增长理论：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	79
6.1 卡莱斯基的经济思想回顾	79
6.2 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	86
第7章 新卡莱斯基增长模型的批判与扩展	104
7.1 卡莱斯基主义者内部关于投资函数形式的争论	104
7.2 反卡莱斯基主义者对长期中产能利用率内生性的批判	112
7.3 新卡莱斯基主义者对经济趋向长期均衡的机制考察	119
7.4 小结：后凯恩斯主义增长理论当代转向的得与失	130
第8章 重新理解凯恩斯的“动物精神”行为理论	133
8.1 根本不确定性：人类行为理论的本体论基础	133
8.2 动物精神：人类行为的自然特征	137
8.3 惯例性决策：人类行为的社会特征	141
8.4 惯例性决策、创新与动物精神	145
8.5 凯恩斯与后凯恩斯主义人类行为理论是什么性质的理论	148
8.6 后凯恩斯人类行为理论的发展与增长理论中投资行为理论的停滞	149
8.7 新解读带来的新启示	151